

〔德〕英卡·帕莱 著
丁伟祥 丁建耀 译

女拳师

Die Schattenboxerin

译文
新流行

处女作



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处女作

女拳师

Die Schattenboxerin

〔德〕英卡·帕莱 著 丁伟祥 丁建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拳师/(德)帕莱(Parei, I.)著;丁伟祥,丁建耀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7
书名原文:Die Schattenboxerin
ISBN 7-5327-2752-1

I.女... II.①帕...②丁...③丁... III.长篇
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102 号

Inka Parei

DIE SCHATTENBOXERIN

国际中文版授权© Schöffling & Co. Verlags-
buchhandlu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9

图字: 09-2000-115 号

女 拳 师

[德]英卡·帕莱 著
丁伟祥 丁建耀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752-1/I·1599

定价: 11.00 元



译 序

《女拳师》是德国女作家英卡·帕莱于 1999 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英卡·帕莱 1967 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自 1987 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柏林。大学学的专业是日耳曼语言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汉学。

《女拳师》出版后,立刻引起媒体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并受到各方的好评。据 1999 年 10 月出版的《事实》(Facts)杂志报导:小说一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连续数月排在小说畅销书的首位。目前,已有十多家制片商在争相购买将小说摄制成电影的版权。

在 2000 年第五期出版的《德国》杂志中专门有一篇介绍生活在柏林的一批青年作家的文章,据该文介绍,自德国统一以来,人们的思想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作家不再是那些蓄着表示对世界形势不满的大髭须的年长者,而是一群身着 T 恤衫、喜欢与朋友一边喝酒聊天、一边听着音乐的消闲阶层。一些生于前西德后来到柏林的 30 岁左右的青年作家作品里充满着对历史和实际生活深深的渴望。生机勃勃的文学新景象已经来临,作家们开始转向描写永恒的日常生活琐事,描写小人物,描写可展望的东西。无疑,英卡·帕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小说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第一人称的赫尔贯穿整部小说。她在 1989 年参加五一游行示威活动中,由于警察的驱赶,她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地



方,在那儿遭到了别人的强暴。从此以后她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还搬离了原来的房子,住进了位于柏林东部雷宁大街旁的一幢破旧房子里,与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冬克尔做了邻居。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位中国气功师,她就开始在她那儿学习中国的拳击,她不仅学会了“拳打脚踢”,也学会了中国人的生存计谋:三十六计。借助学会的功夫她先后两次施展了她的拳术,取得了成功,小说中有精彩的描述:一次是在一家咖啡馆,她见到两个流氓对店主进行敲诈时,她非常痛快地收拾了他们,甚至用刀切开了其中一个人的气管,还把圆珠笔的笔套放在他还在流血的伤口上。另一次是在柏林火车站,协助她偶尔相识的默尔茨,将两个车站巡警彻底制服,她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别捏住两人颈部的动脉,使得这两个巡警吓得屁滚尿流。

在赫尔惟一的一位邻居冬克尔突然失踪后,她开始对这位从未说过一句话的邻居进行了回忆。然后遇见了前来寻找冬克尔的默尔茨。冬克尔在小说中一直未出现,只是在小说的末尾才露了面。读者主要通过赫尔和默尔茨的回忆来认识冬克尔这个人物的。

默尔茨是冬克尔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巴特霍姆堡市的中学同学,两人曾经恋爱过。在分别多年后他在柏林的一个跳蚤市场上与冬克尔再次相逢。冬克尔是在和默尔茨相约外出欣赏柏林景色的时候突然失踪的。默尔茨本人在三岁的时候就随母亲离开东德来到西德,母亲后来在西德又嫁给了一个银行家。默尔茨对继父并不满意。在母亲和继父逝世多年后,这次他来到柏林是为了寻找他的亲生父亲。在寻找还没有着落的时候,默尔茨去抢劫了一家银行。他带着抢来的钱在寻找冬克尔的时候,认识了赫尔。赫尔对柏林比较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默尔茨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在同默尔茨的相处中,赫尔对默尔茨的身世和他同冬克尔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并通过默尔茨又见到了那个强奸过她的法国人。



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对三个人物周围事件的叙述,以鲜明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柏林墙被推倒后笼罩在人们身上的一种抑郁的情绪。借助主人公赫尔的视线,读者在柏林这个大都市中看到的主要是城市被毁坏和破旧的一面:如拥挤狭窄的城市、破旧的房子、成为一片旷野的旧火车站、发出刺耳的电车履带声、锈迹斑斑的铁轨、布满撞瘪窟窿的老爷电车、堆满垃圾的地下隧道、发出霉臭的电话亭、洗劫一空的酒店、遗弃不用的咖啡馆等等。诚然,作者着意对位于施普雷河畔的这座正处于变革的大都市的这些描写,也正是从另一面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伤痛,反映了在两德统一后人们失去方向的一种心态以及对生存受到威胁后感到的一种茫然。与此同时,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又盖起了新的办公大楼。“它们是那么的耀眼和完美,以至于使人们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或许它们是来自于远方,突然降临在有沙土、煤炭以及废墟垒成的星球上。”给人以一种陌生感。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冬克尔在失踪后终于出现在她的房子里,她第一次邀请赫尔到她房间里去,并还邀请她一起去用早餐。冬克尔将离开这儿要搬迁到其他地方去。小说是以赫尔问冬克尔“是否需要找一个住在一起的女伴”结束的。德国报纸的一篇评论说:作者在这里暗示冬克尔和赫尔在经历了曲折后,对未来又开始有了憧憬。通过这个结局,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德国人的画像:在经过多年不相往来后,德国人开始愿意共同相处。

这三个人物的德文名字都有特定的词义,赫尔(Hell)表示明亮,清醒;冬克尔(Dunkel)表示黑暗,摸不透。首先小说对两个人住房的描写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赫尔的房间整齐,清洁明亮;而冬克尔的房间却是阴暗,乱七八糟的,在遭到一次失火后更是一片狼藉。赫尔尽管遭到过不幸,但经过在中国气功师那儿学会了拳击和同默尔茨的相识,她逐渐摆脱了生活中的阴影,更加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另外她始终出现在小说的每一章节中,读者在每一



章节中都可以随着作者的描述去更好地认识赫尔。相反,冬克尔在小说中一直未露面,始终处在黑暗中。据赫尔的回忆,她的生活空间充其量也就只是自己的房间和住房周围的几条马路。她有不少怪僻的习惯,还曾经失恋过等等。只是在小说末尾她才与读者见面,她要搬出去住,她要改变原来的生活,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这是一种希望的表现。两个人曾住在一起多年,但从来没有说过话。现在她挽着赫尔的手臂,显得很亲热,包括赫尔现在也想一起随冬克尔搬过去,开始过新的生活。默尔茨(Maerz)表示三月,三月象征春天的开始,大地万物复苏。默尔茨认识赫尔后,尽管默尔茨给赫尔带来了不少麻烦和烦恼,但默尔茨对赫尔摆脱过去的阴影和恐惧有一定的影响,给赫尔带来了希望。所以在小说的最后,默尔茨也没有再出现。

关于小说的语言,在原版小说的前言中介绍道:这是一部在语言上非常能打动人的城市小说。《汉堡晚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充满生气、活力和紧张气氛的小说。

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友人弗洛琳女士的多次帮助,对原文当中的一些疑难之处,弗洛琳女士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解释和说明。译文完稿后袁志英教授阅读了部分译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谨向两位热心人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译者

2001年6月



1

1

她是我的邻居。我们住在同一楼层已有多年了。我们常常是同时将沉重的钥匙插入已有百年之久的门锁,然后我就消失在门后的过道内,过道又长又窄,不足一米宽,地上铺着用大麻编织的黄色地毯。她也同时消失在她家门后面的地板上,地板上漆的是四十年代流行的棕色油漆,看上去令人生厌。那颜色暗淡无光,如同狼狗在吃了主人喂给它的铁锈色的狗食团后拉在马路边上的狗屎一样无法铲除掉。

一个星期以来,坐落在雷宁大街上的这幢早先是犹太人的优雅的出租公寓大楼的侧翼一片寂静,只有她和我还住在这个楼里面。这一侧翼边房呈正方形,其中一个角已被铲掉,楼内的柏林式房间阴沉沉的,从外面看去,房间的三面是外墙,没有暖气设备,厕所就在上下层的楼梯中间。

在冬天来临之前,尚住在楼内的那几位仅有的房客都搬走了。大部分都搬到附近的某个亲戚家,或搬入那种带有中央空调和垃圾管道的板材建筑房屋内,或是搬到坐落在城外的马尔查尼和赫



勒斯多夫小镇上。最近刚搬走的是一位住在地窖里的老妇，二十年来她一直拒绝离开她这个窝巢，她无亲无故，又是个半盲人，裸露的双脚用花布裹着，她在十一月初也被送进了养老院。

现在我敢肯定，这幢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几天来公用厕所的抽水马桶的抽水声都是由我一个人搞出来的。我的邻居已都离开这里。钥匙的碰撞声，轻微的咳嗽声以及陌生人的脚步声是再也听不到了。除了偶尔袭来的大风砰地把院子的大门关上外，这儿是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只有我走在楼道破碎瓷砖上的脚步的回响声。

我翻起大衣的风帽，手提一大捆装满垃圾的塑料袋走进院子。

我想用一根带钩子的棍子将一星期以来的垃圾清除掉。清扫工曾在夏天最后一次来过这里，把成吨的废铁垃圾运走了。现在在我的这种方法倒是需要一种特别的工具和一定的技巧。现在正是临近中午时分，住在旁边大楼里的邻居都上班去了。要是他们站在窗口直瞪瞪地看着我在下面扔垃圾，我会感到很尴尬。

我走到铁栅栏旁边，这个铁栅栏自从东西德统一恢复私有制以来就越过砖墙的墙脚延伸了出来，将邻居家的地盘和我们大楼的地盘隔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棍子穿过一个手掌般大小的洞口，直至钩子将垃圾桶的塑料拉手钩住，然后使棍子的一端着地，另一端将垃圾桶盖子掀开，接着把用绳子扎紧的装满垃圾的淡绿色垃圾袋向对面扔去，我希望垃圾袋最好能落到铁栅栏那边的垃圾桶里面，或者至少是掉在垃圾桶的旁边。

我足足扔了数分钟，并不时改变扔的角度，扔完垃圾后就转身拿起放在我身后的装有空瓶子的塑料袋，这些瓶子我得送到商店去要回押金。突然我看见了这块牌子。

这块牌子昨天还没有，它是用螺丝拧紧在涂满字体、砌以潮湿煤砖的灰不溜秋的墙上的，这块牌子很耀眼，也很新，这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牌子。牌子上用油漆画了两幢并列在一起的房子，下面



写着公司的名称和地址,用框子框了起来。

我靠着栅栏,闭上眼睛,呼吸着这冬天的潮湿空气,并想象着这墙里面是空空如也,然后重新睁开眼睛,这块牌子依然还在。

当周围其他所有房子在先后进行翻修和改建的时候,人们显然并没有忘记这幢逐渐倒塌的楼房。我早就预感到,我不可能长期躲藏在这里,因为我既没有租房合同,也没有在哪个管理部门登记过。但是,为什么在这同一时期正式居住在这里的最后一位邻居也消失了,她就住在我的对面,每天与我一起共用楼梯口的厕所,她的名字叫冬克尔。偏偏在这个时候她把我一个人留在了这里。在最近几年中她从没离开过这儿,甚至没有一整天或两天都不在家的時候。

我时常看见她慢慢沿着楼梯扶手朝上走来,两手前臂高高举着塑料袋,里面装有刚买来的东西。她小心谨慎,很有可能是当地人。她从没有客人来造访。我也根本记不起来是否有人按过她家的门铃。她的一些怪僻习惯倒还记得一些:那双黑色的靴子是系带子的,总是放在脚垫左边,鞋尖朝外,右边放的是装煤灰的桶。而我门口放这些东西的位置恰恰跟她相反。晚间八至九点的时候,如果不外出的话,能听到她门上保险门锁的响亮的关门声。有时她是先把门打开,然后又很快把门关上,这是想把夜间吹进楼道里来的冷风拒之门外。

我没再去想她。我敢肯定,她的生活圈子充其量除了这三十五平方米的几乎不用支付租金的房子和我们共同享用的楼梯外,不外乎就是我们附近围绕罗森塔勒广场的几条马路以及邻近的几个行政区的范围之内。现在她一下子失踪了。我确实感到不可思议,有点失去了平衡。

几天来我始终处在那些在夜里频繁活动的各种小动物的包围之中,如昆虫、蜗牛、蟑螂和小老鼠,它们使我整天不得安宁。前不久我还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即我对那幢已无人居住的位于侧



翼边房中间的临街房子进行了观察。底楼房间里的那些米色软垫沙发已经发了霉,在夜梦中我梦见这些发霉的沙发在我身上盘旋,与挂在二楼窗棂中的十字挺架上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员穿的衬衫连接在一起,这件衬衫由于很久没洗硬得像木板一样,领子又同我的皮肤连在了一起。我想脱都脱不掉。一句话:我已失去了自控能力。

一根檐沟的残余部分悬吊在屋檐下,融化的水滴在我的头顶上,水顺着我两耳的内侧流进了脖子。我抬头朝最上面的一层楼看去。一个星期以来由于没有浇水冬克尔厨房窗台上放着的盆花已经开始枯黄。我踮起脚尖继续观察。我在想冬克尔至少应该托我帮她浇浇花,她为什么不同我说呢?透过不是很透明的窗玻璃我看到一罐香草盐的模糊轮廓和一桶外包装上印着蓝白颜色的牛奶,还有一只圆面包。我想象着面包上刀切过的一面已经长毛和发绿了。

我把视线又投向了旁边的一扇窗,我觉得玻璃后面正有什么东西在晃动。我吓了一跳,手中的瓶子都摔了。接着仔细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我一跃而起踩在拍地毯的棍子上,接着爬到另一堵与人一般高的墙上,这堵墙把院子隔开了。一个青绿色影子像火焰一样在冬克尔房间里窜来窜去。我能听到房间里一位男播音员很轻的时断时续的广播声音。这时厨房和卧室里的灯亮了。我在纳闷,冬克尔房间里的灯会是谁打开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无形的手开的灯,这只手肯定是属于某一个人,这个人已一个星期没有享用过暖气,没有上过厕所,而且肯定对我邻居的失踪负有责任。

我手里拿着的那袋空瓶子发出丁丁当当的声音,我快速朝街上跑去。



2

在密尔卡的咖啡馆品尝着薄荷茶和土豆汤,我的心静了下来。店主是从罗马尼亚来的,他脸色苍白,黑色的头发,朝我打量了一下,随手把烟灰缸推到我面前。我把烟叶装满烟斗后,就倚坐在角落里我常坐的椅子上,坐在这里整个店堂和魏因贝尔格大街的一角我可以尽收眼底。

街上有三个头发凌乱的吉卜赛小女孩在拼命争夺一只黄色的塑料钟。这是他们从一台口香糖自动机上钓来的,这种自动机是专为孩子们设计的赌博机器,投两个马克硬币进去,一只带有小盒子的金属章鱼便转动起来,而机器上的触手往往抓住的只是一颗染色的糖球。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从后面袭来,将这只塑料钟抢到手里。当姑娘们突然跳起来时,他就乘机将猎获物塞入橡胶靴子里,同时张开他那带有疤痕的嘴狞笑着,嘴里的金牙暴露无遗。在男孩蹦蹦跳跳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看到他那在内战中受到伤害的鼻梁在抽搐。

这个时候咖啡馆里的客人很少,就两位客人。除了我以外,另



一位是穿着苹果绿的毛衣和橙色皮裤的时髦女士。我的朋友密尔卡给我送来了牛奶咖啡。他的动作有些笨拙,手有些颤抖,但还是很平稳地将冒着热气的咖啡端到了我的桌上。

在这个贫穷的、依靠开餐馆养家糊口的画家身上看不到一丁点的人时衣着。酒柜旁一个狭窄的楼梯通向那个已经扩建过的地下室,这里就是密尔卡的画廊,里面展出的全是大尺寸的反映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的恶梦般的画:在寒冷的繁华大街上的人们,脸部和脖子软得似面团,暴政看上去似乎变成一种压制人们生长的荷尔蒙。站在锈迹斑斑的窗户后面的孩子们的头部的写照,没有脖子和身子,就像大白菜那样堆积在那儿。每个看完画走出地窖楼梯的人,脸上看去都是毫无血色的。密尔卡长得就是这么一副脸。还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买过一幅画,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第二次光顾地下室的画廊。

想要了解冬克尔消息的尝试没有任何结果。我平时对她也太少关注。也许像我和她这样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比比皆是吧。

记得在前年的春天里,有一次我站在她门前想按门铃,门铃在右边,可我却却在左边寻找。我当时的感觉是,由于开自己家门的习惯动作,现在把左右都颠倒了,就好比我突然改为用左手写字一样。我手里拿着她的邮件,邮递员可能把我们俩的名字搞错了,将她的信件塞进了我的信箱里。当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时,我们俩都耸了耸肩。我们门对门住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年,但像这次两个人挨得这么近,从来没有过。我顿时有一种像看到无法控制的尴尬场面的感觉,赶紧把邮件塞进她的手里,又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

我回到侧翼边房后我会撬开冬克尔房间的门,在王师傅那儿学了几年的功夫,凭借我的本事要打开这儿附近地区房子的门是不在话下的。叫警察来并不是上策,因为我不是以合法身份住在雷宁大街的,再说也不知道警察是否会把狗带来。我在王师傅那



儿不仅学会了拳打和脚踢,也学会了中国人的应急计策,即三十六计。他教我学会了等待,即等到合适的机会到来。那么我就等吧。我抽烟斗时的缭绕烟雾能使我保持冷静。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四计:以逸待劳。



3

这几天我已有好几次装错烟叶。我想抽的是带有东方香子兰味道的烟丝,可装上的却是很呛人的法国烟丝。我很厌烦地把烟斗扔在桌上,死死地盯着烟斗看,现在烟斗在我面前犹如一个想朝我扑来的小精灵,它那张令人憎恶的脸又重新出现在蓝色的烟雾中。像一个幽灵从浓烟中钻出来盯着我看。这张脸我永远都不再想起它。

在一九八九年一个春天的日子里,我又来到外面走在大街上。我又回到了原东西柏林交界处的生活中间。这里今天已完全变了样,对我来说一切变得很陌生。我已经忘了,这种生活曾经带有一种欺骗性和冒险性,是那样的漫不经心,致使我们今天要为此付出代价。面对今天的生活我时常是力不从心的。

这天天气很热,在春天显得太热了些。热气和沙尘在位于克罗依茨贝格区格尔利茨火车站周围的各条街道上空回荡。沙尘是从火车站的废墟那儿吹过来的,原来的火车站如今已变成荒芜的空地,只有那两条铁轨还在,数十年来铁轨被柏林墙拦腰斩断,早



已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又回复到了过去的不毛之地,成了一片旷野。

天色已近黄昏,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已陆续回来。许多土耳其人开着中型面包车在寻找停车场,车里塞得满满的,甚至连车顶上都堆满了东西,车上的人陆续下车,关上车门。将那些疲惫不堪的孩子和吃剩下的烧烤肉拖进冷冰冰的屋内。一个露出乌黑门牙的姑娘朝房屋的外墙观望,一幅画的边框散成一缕缕的,被粘在上面的胶水弄成波浪形状。

一队人刚参加完示威游行,从劳齐茨广场回来。他们一直朝我跑来,看上去轻松自然,不躁不急,但从他们严肃认真地朝同一个方向跑去的样子,又似乎显得很紧张。开着装有栅栏、白绿颜色相间的警车的司机在街区内漫无目的地兜风,显得很无聊。他们偶尔停下车来聊天,或者卷起土黄色警服的袖子用对讲机进行联络。马路对面两个十六岁左右的巴勒斯坦姑娘用红布裹着鼻子和嘴巴,正围着马路中央绿化地的花坛,在路基上铺石块。

朝会合点聚集有多种可能,人们可以从东南方向,即从太阳街过来,再拐进维也纳大街,这条马路的尽头是一片绿化地带,从那儿再慢慢进入满是尘土的另一条街道,这里沿街都是闪着微弱灯光的小酒店和脏乱不堪的游戏机房和洗衣坊。这条街一直延伸至高架铁路的钢梁那边为止。这儿是交战双方都想占领的战略中心。人们同样也可以从西北方向的奥拉宁大街出发,走到阿达尔贝尔特和马利亚纳两条街的交汇处,然后向高架铁路靠拢。我要去的目的地是位于一个正在打地基的建筑工地旁的土耳其小吃店,一年前的今天这儿有一家超市被烧毁了。

今年我决定从东南方向出发向会合点靠拢。我一边慢悠悠地沿着宽敞的人行道朝前走,一边逐一数着我要横穿的五条街的街名,过完这几条街后就拐弯,一旦出现危险情况,我也可以很快地跑掉。这五条街的街名分别叫格罗高街,里克尼茨街,福斯特街,



厄尔奥街和劳齐茨街。通过这几条街可以到达很安全的地区。在那儿可以较方便地到达车站,每隔数分钟,就有一辆黄颜色的双层汽车晃晃悠悠地隆隆开过来停靠在站上,然后沿着库特布斯大街朝前开去,这样就可以脱离危险区。

一个穿着印有彩色图案衬衫的胖子拿着木屑棒站在装有栅栏的玻璃前守卫着一家土耳其银行。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茄克衫的便衣警察正在一家比萨馆的门口解开沾满油腻的塑料绳。远处,加勒比海鼓的敲击声在街的深处发出回响。我穿过拥挤不堪的人流朝前走去。人行道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头上梳了一串流行的辫子,这些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人身上穿着西装,由于拥挤西装都变得皱巴巴的,看上去很不协调;有的人头上蒙着黑色头巾,由于炎热,这些化纤头巾还会发出亮光。那些参加街头巷战的勇士的手正流着血,有的人戴着鼻环的鼻子已在化脓,还有一些人穿着笨重的靴子,靴子上面雪白的小腿肚就裸露在外面。现在我快到达目的地了。安卡拉烤肉店只隔着一一条劳齐茨街。那儿中午就摆好了很多塑料椅子,这些椅子就放在门槛和自行车车道之间的场地上,这样便于向四周的人群出售烤肉和瓶装热啤酒。

我跟在两个脸上盖着羊绒帽,手上拎着汽油罐的人后面想穿过马路。猛然听到一阵尖锐刺耳的刹车声,几辆警车刚好拐过弯来。车子还未停稳,车门就打开了,穿着绿色铠甲的警察纷纷从车上跳下来站在马路上。他们就在我前面排成队列。整个一队人头戴塑料面具,胸前戴着护胸,手中高高举着防护板。我身边很多人惊慌失措地朝相反方向跑去,我也一起随着人流朝前涌去。

我真应该站着不动。

我是几个星期后口中仍不断喃喃自语的惟一的一个人,独自一人,一对眼睛充满了恐惧感,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嘴里含着冰冷的烟斗,烟嘴又苦又涩。我没有停下来,我任人流推着自己越过马路,然后跌跌撞撞地穿过一片灌木丛,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小